

对话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

“奥德赛”也是具有广阔可能性的原野

前沿观潮

访谈嘉宾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近年来,是作家也是评论家的李敬泽,频繁在网络上露面,聊文学、聊人生。

互联网是年轻人的主场,而年轻一代也终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力军。身处这个时代,年轻人如何和他们正在经历的“奥德赛时期”和解?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和李敬泽进行了深入交流。

青年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更是一种精神价值

记者:您怎么定义“青年”?在五四运动中显现的“青年”概念,在当代有哪些现实意义?

李敬泽:“青年”这个词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不仅指向人生的一个阶段,更包含着一系列现代价值。

实际上,古人并不怎么讲“青年”,但现代以来,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青年》杂志,“青年”成为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正等待着我们去创造,朝气蓬勃的青年,肩负着面向未来、创造未来的责任。

从1919年到现在,这种青春的热情和勇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

我们终究都会在自己的“奥德赛”中实现成长

记者:最近,“奥德赛时期”一词很流行,它指的是青年脱离校园后,在职业、情感与自我认同中反复试错探索,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您怎么看所谓的青年“奥德赛时期”?

李敬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比喻。荷马史诗里,先有《伊利亚特》,再有《奥德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马上想,什么是“伊利亚特时期”呢?想了想,对年轻人来说,一路考试、求学,像打关一样,可能就是他们的“伊利亚特”吧。

一个人毕业了,面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确实有点像“奥德赛”。《奥德赛》里,奥德修斯打完了特洛伊,要回家去,一路上艰难险阻,但那些焦虑、不确定,也正是一个人经历世界、逐渐成长的过程。

一个没有“奥德赛时期”的人生,未必很值得羡慕。如果刚毕业,一切就高度确定,这当然非常好。但当您20多岁时,就已经清清楚楚看到了自己的60岁,这真的令人向往吗?

每一代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奥德赛时期”。一个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面对不同的“奥德赛时期”。奥德修斯后来被反复书写,现代主义的很多大作家写过,因为他的漂泊隐喻着现代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既离家远行又回归故乡。这种命运有它的艰辛和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是成长,是生命的丰富与壮阔。



5月9日,李敬泽接受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磊 摄)

我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那里收藏着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资料 and 作品。墙上那些作家的照片下面都有他们的简历。看着那些简历,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现代作家的简历普遍比较长,因为他们一生做了太多事情。假设您是1919年从北京的大学里走出的人,你的简历不可能不长,因为你经历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各种各样的颠簸和变动。越往后的人,简历越短、越简单;某年大学毕业,某年到某单位工作至今。这种“短”,是我们后来人的安稳和幸运。但也得承认,那些现代作家、那些大师们,确实了不起。他们人生的宽度和丰富性,让您觉得他们很“大”。相比而言,我这一代人就没有那么多的颠簸,但很多时候我感到,我相对于他们是“小”的。

这种“奥德赛”,既然经历着,就如同爬山,也许同时可以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信心和期待。实际上,我们不仅有一个外在的“奥德赛”——一个人遭遇了多少事,还有一个“内在的奥德赛”。当我们遭遇世界、经历世界、面对不确定时,我们能否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热情和勇气;能否在生活和世界的各种变化中实现精神上的成长,拥有更广阔的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

不是靠天天苦思冥想就突然发现人生的意义

记者:如果“奥德赛时期”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阶段,那么如何度过这段时期?

李敬泽:我不知道。这终究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什么统一的答案。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人生的基本问题,但任何基本问题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新问题。你不能说前人解决了、前人走过了,到我这儿就没问题了。到了我这儿,生活是我的,生命是我的,我得重新面对和求解这些问题。可能再过五十年,现在的年轻人都老了,他们发现那时候的年轻人依然要面对自己的“奥德赛”。这是每个人生命里都有的东西,我们都得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最后找到人生的方向,有时候“一览众山小”了,有时候却抵达不了,或者似乎抵达了,却又觉得“好像也没啥意思”,似乎在想着新的旅程。这永远不会停歇,正因为不停歇,人类才会不断前进、不断更新。

现在国泰民安,其实每个人的选择空间远远大过了我们的前辈。但对每个人来说,选择的艰难和焦虑都是切实的,人和人千差万别,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回答。都要靠我们从自身出发,

去面对、去决断。

但是,有一点是根本的,我们的选择不仅是为了“活着”,更是为了找到“意义”,这就是和他人、更广大的事物建立起生命的连接。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连接感不强,结果必然是意义感不强。所以,如何建立这种连接,是每一个人都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靠天天苦思冥想就能突然发现发现人生的意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生命之所以宽阔而丰沛的来源——就在于我们和世界建立起丰富的精神连接,这种连接当然主要不是靠苦思冥想,而是靠行动,把自己向着世界打开,走过去,那是“奥德赛”,那也是意义的生长。

当然读书和思考也是重要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验。我们的烦恼是很具体的,但从本质上说,关于成功与失意、挫折与顺畅……所有这一切,无数的前人都经历过,不是只有我经历过,我们需要从前人的经验那里获得启示。

天天让人工智能夸自己其实是很危险的

记者:我们正在经历的人工智能时代,是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那我们又该怎么在前人的经验里找到应对的方法呢?

李敬泽:前人的经验也许依然有效,而且是“人之为入”的基本经验——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他者”(这是一个哲学词汇,意指“我之外不有的存在”)的兴趣与热情,保持走向他者的勇气。

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天天抱着人工智能,久而久之,很可能到最后你也分不清到底是在使用它,还是它在奉养你。说到底,人工智能是你自身的一种投射。有的朋友天天让人工智能夸自己,变着花样地夸。但想一想,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我说的是对自己危险。

它固然很“治愈”,但问题在于,如果这变成习惯,长年累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它,没人会那么夸你、那么顺着你。时间长了,当你抬头面对家人、面对现实中的其他人时,你会感到严重不适,甚至会失去面对真实世界、面对他者的热情、耐心和能力。这可能就真的触及人的根基了。

推开窗、推开门才能看到我们之外的世界

记者:一些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个问

题。

李敬泽:如果屋子里没有窗户没有门,只有一面镜子,天天在镜子里照的只有自己,这当然有问题。我们还得有窗户、有门,推开窗、推开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之外的世界,是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如果对窗外、门外没兴趣了,天天守着镜子,可能是很爽、很舒服,但实际上这是“上瘾”了,不能自主了。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在最基本的事情上能够做出主动选择的人、对自己负责的人,而不是坐在这里,听任自己上瘾。

长远来看,我不相信我们真的会那样。但它造成的问题,其实已经隐约可见了。一开始是它帮你,到后来就变成你依附它了。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哪怕只是和他人日常交流,我们都得动脑子,经历一场复杂的头脑风暴。渐渐地你觉得累,你觉得还是和人工智能打交道更轻松,时间长了,你会失去你的语言,那种和真实世界交流的语言能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需要高度清醒的自觉。

当技能的壁垒灰飞烟灭时,就意味着底层逻辑随之改变

记者:许多人已经开始用AI进行文学创作,您觉得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李敬泽:就一般写作水准而言,人工智能已经超过大多数人。有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可我想说,也别太自信。当你晃悠悠、吃饭睡觉的时候,人工智能正在努力地学习,一刻也没有停止,正以巨大的能力在学习。

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是用语言来进行自我想象、自我表达,并与世界建立情感和意义的连接。这个能力,可以说是人之为入的根本。如果我们把语言的能力最终全部委托给了人工智能,如果我们失去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能力,那么我们失去的就不只是文学,而是人之为入的根基。

记者:人跟机器终究还是有不同的。我们知道事情是人工智能在帮我们做,我们心里始终有这个意识在。

李敬泽:笼统地说,我们可以抱有这种信心。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太自我放纵,并逐渐上瘾,就会渐渐失去自主能力。

记者:人的创造力会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而消失?

李敬泽:人工智能一定会带来文艺形态的根本性变化。什么叫“根本性”?就是底层逻辑变了。以前你想成为作曲家,要从小学习,花上十几年才行;现在可以直接生成。别小看这一点——当技能的壁垒灰飞烟灭时,就意味着底层逻辑也随之改变了。我们如何定义“创造”?艺术创造与我们的身体、与生活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都在被重新界定。

我不知道答案,这个答案正在生活里、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生成。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这里包含着入的成长、人的全面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的未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会发生今天难以想象的革命性的变化。三年前,你能想到人工智能以及它带来的这些变化吗?现在,我们觉得它好像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现实的一部分;但在三年前,你还觉得那是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一代面对的固然是不确定性,但这个“奥德赛”也是具有广阔可能性的原野,前面是一个有着无穷的、全新的可能性的世界。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常少华 周磊 杜宇慧)

□ 程美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面对现实的挑战和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战略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学习西方,在发展中处于跟跑状态。经过百余年的学习和发展,我们的知识体系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占比仍不足,而一个大国要成为强国,必须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

西方国家的霸权,表面是军事力量霸权、物质财富霸权,背后实则是知识霸权,而知识霸权又衍生出语言霸权、价值观霸权和国际秩序霸权。

在语言方面,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并不大,但英语成为了全球通用语言。十年前的互联网信息中,90%以上是英文信息,而使用人口占世界1/5的中文,互联网信息占比还不到5%。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通过孔子学院等平台大力推广了汉语,但目前中文的国际传播力仍然不足,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这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价值观方面,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被一些国家片面等同于人类共同价值。国际秩序的规则也由西方主导,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等理念被其强加于世界。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西方构建的知识体系。

在国际秩序方面,规则也由西方主导,这与西方构建的知识体系也有很大关系。当前的国际秩序源于1648年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二战后的联合国逐步发展而来。这套秩序虽有其价值,但深深烙印着西方的痕迹,西方甚至会在现有规则对其不利时随意破坏和改变规则。

你看美洲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一个叫阿美利哥的人,1507年,德国的地理学家用他的名字命名了美洲,最后演变成现在的名称。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要明确哪些需要重点原创创新,哪些本就属于我们且需要在科学传承、系统整理、结构完善的基础上实现与时俱进的重点综合创新。

自然科学领域,现代生物技术、芯片、人工智能技术等核心科技很多由西方首创,在一些方面我们目前仍处于跟跑或者并跑状态;社会科学领域,现代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我们最初在一些领域也都是学习西方,如今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有些知识早就是中国自主的,比如中国的语言文字、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书法国画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经过长期发展,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拓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更是中国独有的学科,这些领域的研究中心不是要重新建构,而是需要系统整理完善,实现更高水平的综合创新。当然,无论是需要原创创新的领域还是需要综合创新的领域,国家都要大力支持,但是在研究的方法、路径、目的上需要搞清楚,否则就容易把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搞成“一哄而上”的运动式学术研究。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走封闭化的道路,不能排斥西方的优秀知识成果。党中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核心是在充分吸收外来知识的基础上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拓展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而非闭门造车。如果为了强调“自主”就走向封闭,最终只会陷入发展的困境。

同时,还要跳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不能将西方的知识体系与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完全对立。苏联曾为了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将生物学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批判基因理论,推崇米丘林的突变理论,留下了历史教训。社会主义文明是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能将资本主义文明等同于欧美,更不能对西方的优秀成果一概拒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早已被证明是荒谬的,我们要避免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再次陷入这种简单的对立思维。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切忌空喊口号、做循环论证。如今部分社科研究者谈论自主知识体系,只是流于表面的口号,并未深入实践。比如,目前我们的某些社会科学,过于迷信西方的部分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实践,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抛弃、废除这些知识内容,而是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我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但并未简单照搬,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论。比如,我们超越封建专制制度借鉴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但并未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再以成熟的理论推动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并行。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远的发展战略。一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就像在别人墙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不堪一击。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切忌空喊口号、做循环论证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与中国故事的“可理解性”

□ 刘涛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

这部电影让无数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真切地“走进”了一种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等待、牵挂、隐忍、守望。这是观察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很有意味的例子。

“理解”往往首先来自经验感知

人们通常认为,理解产生于知识积累。但现实中的理解,往往首先来自经验感知。

《给阿嬷的情书》打动观众的,不是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那些看似平静却不断累积的生活经验,阿嬷守着一箱泛黄的侨批等待远方消息,跨越山海的一封封书信维系着几十年的牵挂与守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沉默、克制和彼此惦念,构成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情感经验。许多观众之所以被感动,并非因为他们了解侨批文化或潮汕历史,而是因为等待、思念、守护这些情感经验本身具有跨文化的可理解性。不少观众在评论区留言,“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外婆”“电影里好像就是我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并不是建立在某种文化知识基础之上。在世界上,很多人未必深刻了解中国家庭的伦理结构,也未必知道“孝”的文化传统,但他们知道被照顾、被牵挂意味着什么,

知道家人离别时的不舍,也知道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情。也就是说,人们理解一种文化,很多时候不是先理解它的观念,而是先进入它的经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理解不是信息接收,而是一种不同经验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换言之,理解不是A把信息打包扔给B,然后B解压缩。理解是两种不同的经验视域,在某个具体的、真实的、可感知的交汇点上,慢慢“融”在一起的过程。

一个巴西观众会懂中国“孝道”文化吗?不一定。但等待这件事,全世界都懂。牵挂这件事,不需要翻译。那些没说出口的感情,是人类共通的经验货币。

“说得更多”不如“容易进入”

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于通过数据、概念和宏观叙事来讲述中国。比如“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多少倍”“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多少公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这些内容非常重要,它们构成认识中国的重要基础,但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首先是一种结论。

一个结论,就像一道已经解完的数学题的答案。你看到了答案,但你没有经历解题的过程。假如说“农村电商发展迅速”,这只是一个抽象判断。如果换一种表达,一个偏远乡村的农民,第一次面对镜头直播时紧张得说不出话,后来慢慢

学会介绍产品和网友聊天,再后来拥有固定客户群,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看到后台出现新的订单。同样一个变化,后者更容易被感知。再比如说“中国数字生活发展迅速”。这是一种概括,但如果说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第一次学会扫码支付买种子,反复尝试了很多次,成功后自己笑了很久。这个过程更容易被想象。原因在于,过程比结果更容易形成认知代入。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触动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文化的很多经验——勤劳、韧性、含蓄、顾家、对土地的依恋——从来就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它们就藏在最日常的生活肌理里。这就很容易产生弗洛伊德“投射性认同”理论所讲的东西,个体通过代入来理解他人。一个人将自己置身于作品中的角色或情境中,产生共鸣和情感共振。

从“展示中国”到“体验中国”

过去我们习惯于把传播理解成一种展示,把最好的内容摆出来,希望别人接受。但真正有效的方式,或许不是展示,而是参与。

近来,一些海外网络平台关于“成为中国人一天”的内容,之所以容易被广泛传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在讲“中国是什么”,而是在说“你可以这样试一试”。也就是说,它提供的是一种体验路径,而不是简单介绍。喝热水,练入段锦,去菜市

场买菜,坐高铁旅行,学着和邻居聊天……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却在不断积累一种理解。

很多人并不是先理解中国文化的全部意义,才开始这些尝试。恰恰相反,是在一次次尝试中逐渐形成理解。这有点像学习一门语言,没有人会先掌握全部语法,再开始开口说话。更多时候,是先学会一句简单表达,再一点点进入新的语言世界。文化理解也是如此。从《给阿嬷的情书》中对家庭生活的细微感知,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在中国生活一天”的日常记录,其共同特点都不在于展示某种宏大意义,而在于提供进入经验世界的路径。理解不是前提,而是过程。不是先理解,再体验,而是在体验中不断形成理解。

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也恰恰在于在差异中建立理解的可能。传播的核心任务不是把包裹完好的“宝贝”投送到对方的意识中,而是创造条件,让对方自己的感知系统开始工作。

对于今天的中国故事而言,“讲好”或许并不意味着表达得更完整、更丰富,也意味着提供更多能够进入的路径。“可理解性”真正重要的价值,不在于让所有人迅速形成一致认知,而在于为不同经验世界之间创造持续进入彼此的可能。

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中国故事里走一遍,中国故事就不再只是被讲述,而开始真正被理解。(作者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党委副书记)